

論 財 产

[英] 葛 德 文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論 財 产

[英] 葛 德 文 著

何 清 新 譯



商 务 印 書 館

1959 年 • 北 京

論 財 产

[英]葛德文著 何清新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京华印书局印刷 红旗装订厂装订

統一書号:2017·40

1959 年 10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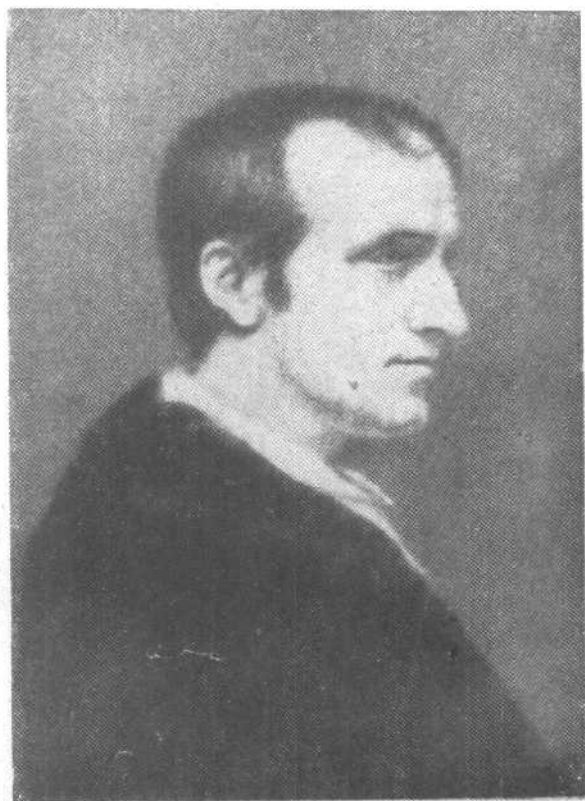
印张 5 插页: 4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 0.80 元

WILLIAM GODW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LONDON, 1793
BOOK VIII: OF PROPERTY

作者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是十八世紀英國急進作家。早年信奉加爾文派教義，在法國啟蒙學者的思想影響下，轉變為無神論者。他一生從事文學活動，寫過幾部小說，此外還撰有政論和歷史著作多種。1793年出版的《政治的正義及其對於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一書是他的一部主要政論，《論財產》是這部政論中的一篇。在這篇政論中，葛德文從理性原則出發，對私有財產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作了尖銳的批判，提出應該以按需分配來代替按財產分配。本書是研究西歐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本重要參考書。現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費金娜譯的俄譯本轉譯出版，書前還譯載了沃爾金院士撰寫的《威廉·葛德文的社會思想》一文，一併供讀者研究參考。



威廉·葛德文

目 录

沃尔金：威廉·葛德文的社会思想	1
-----------------	---

論 財 产

第一章 論符合眞理的財產制度	31
第二章 正确的財產制度的优点	38
第三章 基于豪华生活具有良好作用的意見 而对我們制度提出的異議	48
第四章 基于担心会被誘入游手好閑之途而对我們制度 提出的異議	50
第五章 基于我們制度的不稳定性而对我們制度提出的 異議	57
第六章 基于我們制度所造成的限制的殘酷性 而对我們制度提出的異議	63
第七章 基于人口增加的观点而对我們制度提出的 異議	76
第八章 建立合乎眞理的所有制的方法	82

附 录

1. 以实例說明政治制度的影响	99
2. 社会和政府	106
3. 論人类的平等	108
4. 論革命	111
5. 民主制度和走向完美的道路	114
6. 政治組織的未来	117
7. 論行政管理	123
8. 論政府的消灭	124

9. 論法制	126
--------------	-----

附 注

費金娜：威廉·葛德文的生平和創作	135
注釋	142
書目	150

威廉·葛德文的社会思想

B. II. 沃尔金

I

十八世紀后半期的英国的經濟、社会和政治制度，許多地方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制度不同。

到这个时期，英国在工商业方面已經远远超过了欧洲其余的部分。英国的商业資本已經变成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力量。英国商业的发展及其百年来的繁荣，促进英国积累了在新的基础上改組工业所必需的大量財富。这种商业也为工业品准备了广大的銷售市場。英国特有的土地演变，为产业資本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自由的”雇佣工人基本人員。

早在十六世紀，托馬斯·莫尔(Thomas More)就曾为农业的尖銳危机和大規模剝夺农民耕地的現象鳴不平。十八世紀，剝夺农民耕地过程出現了特別急剧而狂暴的趋势。在十八世紀英国特有的社会关系下，只有牺牲农民的利益，才能消灭农村中的中世紀殘余。英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力量，乃是基于互相“妥协”而互相密切联系的大地产和資本。这就預先决定了农民群众的命运，他們无力反抗土地变革或在这种变革中保护自己利益。

土地关系的改变，基本上是以形式上取得村社社員同意的所謂“圈地”形式进行的。实际上，毫无組織和受到土地占有者恐吓威胁的农民群众的这种同意，完全是虛构的。农民在圈地之后，丧失了使用村社土地的权利，遭受到圈地时发生的无数濫用权力的殘酷迫害，只是經過很大的努力，才得以使自己的經濟适应了新的

情况。农民大批出卖自己的财产，纷纷离开乡村。同时，随着圈地运动，根据短期契約或根据沒有法律保証的傳統习惯租佃土地的小佃戶被撵走了。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年代农民的家庭工业也因新兴的工厂工业的競争而受到十分惨重的苦难，那末，当代人关于十八世紀末叶英国农村出現的急速破灭过程的記述，更是可以理解的了。

剥夺农民耕地的过程，是同由此吸收了“自由的”工人基本人員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过程彼此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两个过程在同一時間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归根到底都决定于同一因素：建立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所需要的条件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已經成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如果不从根本上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即如果不大批剥夺农民，不形成无产阶级骨干，就不能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工业，也不能向新的耕作方法过渡。

“古老”的英国迅速地改变着它的面貌。一些古老的农业地区大大荒蕪了。兰开夏地方(棉紡織工业地区)以及煤藏丰富和冶金业发达的一些郡，人口迅速增加。許多古老的大城市衰落了，一些由于新兴工业而发展的新的中心城市飞速成长起来。不仅下层階級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十八世紀中叶以前，商业資本和銀行資本的代表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有絕对的統治地位；而現在，工业家已經跃居首位。他們不一定出身于原来的工商界，大部分是一些暴发戶或冒險家，在經濟条件变动时期因不擇手段而致成功，并用各种办法鑽进社会的上層。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十九世紀初期，把这些新資本家說成是英国人中的最沒有良心和不学无术的分子。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成长和依靠无情地剝削工人階級而繁荣起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工业，正需要这种人物来組織。

无产阶级的状况实在痛苦不堪。英国沒有保护雇佣劳动利益的法律。工人本身不能通过与企业主直接斗争的方法，使自己获得

多少还勉强过得去的生存条件。丢掉犁头或自己的布机到工厂去謀生的人，完全失去了滿可以使他們成功地反抗企业主的过度剝削的内部結合。从农业和家庭工业騰出的劳动力的供給，超过了大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新的技术創造了广泛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可能。当工人阶级不顧重重困难走上或大或小的积极斗争的道路时，受阻于英国的立法，这种立法不承認工人有組織同盟和罢工的权利，認為这是違法的“阴谋”。有时，工人們忍无可忍，企图依靠慣例，向国会請願。当然，請願也毫无效果。有时，新兴工业企业的工人对于自己处境的不滿情緒，以自发的騷动形式，即以企图破坏机器的形式表現出来。

通称为“魯德运动”（因这一运动的半傳說性領袖的名字而得名）的工人破坏机器的暴动，早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就已出現。

这个运动不顧政府采取各种鎮压手段（直到处死），有时出現在这里，有时爆发在那里，前后繼續了四十多年。

II

英国經濟生活中的种种深刻变化，不能不反映在意識形态方面。

失望和憤恨籠罩着承受土地革命和产业革命所帶來的苦难的广大城乡貧民群众。在經濟势力不断发展而政治地位沒有相应提高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中間，也产生了反对情緒；这种情緒也渗透在城市手工业者中間，他們在产业革命所創造的新經濟条件压迫下营业显著衰落。对于以大商业-金融貴族和土地占有者貴族联盟为基础的寡头統治的不滿，就这样在英国社会广泛散布起来。当然，这种不滿情緒也流露在社会政治書籍当中。在繼承自然权利傳統的这类著作里，十分明显地表現出十八世紀社会思想所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唯理主义傾向。极端的唯理主义和个人主义，常

使这个时期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产生一种好象預告十九世紀的晚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

从自然权利的前提出发的社会理論，一般都有反对国家的傾向。自然权利以来自人的自然本性的准則为前提。成文法之所以是复杂的，是因为它違反自然。自然規律是簡單而合理的。自然規律与自然相符合，容易被理性所掌握，所以它不需要使用暴力来确立自己。早在柏拉图的学說中，我們就見到了这种思想傾向。我們从詭辯学派，特别是从斯多噶学派的学說中，更能十分清晰地看到这种傾向。芝諾認為服从于自然規律的人类社会，是一种調和的整体，即是宇宙。凡是受理性規律(已被認識的自然規律)支配的地方，都不需要外来的規律。

十八世紀，自然权利理論发展到頂点。自然权利是正在形成的資产階級社会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最适宜的形式。决不能把这种政治思想体系看成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但是，从这个时期的法国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英国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一种認為沒有国家社会也可存在的暗示。例如，在霍尔巴赫的著作里，我們見到这种論断：在明确意識到和正确認識到本身的自然利益的有理性的人的社会里，当然不需要有組織的暴力。

如果寻找限制国家政权职能的这种思想傾向在十八世紀重新抬头的直接社会基础，那末，首先要把它与否認这个时期特有的国家法制的态度联系起来，这种法制从資产階級社会利益的观点看来已是过时的了。这种在新兴的資本主义社会里曾經有过存在理由的法制，毫无疑問，在十八世紀只有成为那个感到自己能够有把握前进到管理国家和掌握政权的社会階級上升途中的恼人障碍。从这个观点看来，可以認為重农学派的著名口号 *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 (自由放任主义)，是这种尽量限制国家政权职能傾向的表现，当然，还是十分温和的表现。

在英国，我們从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普利斯特列(Priestley)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張把国家的大权縮小到最低限度的思想。普利斯特列的理想是尽量簡化政府，使它只担負維持和平和司法的职权。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观点也差不多是这样。亚当·斯密認為，保持和平实际上是国家的唯一正常职能。国家应当保証社会的安宁，其余的一切都应当听其自然。在十八世紀进步人士中間最有威信和前后积极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那里，把这一系列思想規定得更为明确。潘恩說，社会是我們的需要所产生的結果，政府是我們的罪恶所造成的結果。社会永远是对人有益的，政府即使是最好的也必然是作恶的。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越不需要政府。

除了把鋒芒指向政治制度的反对派外，还兴起反对新兴社会秩序的反派。土地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剝夺农民耕地的社会后果，不能不引起人們提出一些符合于顛沛无告的城乡民众的利益和願望的社会改革方案。英国在十八世紀出了一批杰出作家，他們有的属于平均主义派，有的是农业改良主义者，都以独特的方式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反映出英国社会經济发展的特点。

托馬斯·斯宾士(Thomas Spens)是这个时期英国“农业”激进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斯宾士从自然权利理論的命題出发，严厉地批判当时社会制度的无政府状态，主張必須按照普遍和諧的規律来改造社会制度。斯宾士的基本理論前提，都是十八世紀唯理主义著作中所常有的。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的。并且，因为只有土地和土地产物提供生活資料，就可以得出“一切人对土地都有平等权利”的結論。这种权利由于土地被个別人侵夺而未能实现，这种侵夺也为土地的私有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法制并不能取消自然权利。为了恢复每个人对于土地的自然权利，斯宾士提議

廢除土地私有权，承認土地都属于公社所有。但是应当着重指出，斯宾士决沒有把公社所有制的思想与公社組織生产的思想联系起来。他主張，每个公社把土地租給公民，同时租出的地段一方面要足以維持耕作者的全家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与土地的需求相适应。因此，地段的大小并不是經常不变的，公社要随着居民人数的变动，定期調整份地的定額。斯宾士要求公社征收的地租应足以償付国家的一切支出。提出土地公有化思想和用地租代替一切賦稅的計划的斯宾士，毫无疑問是十九世紀和平的、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論者最直接的先驅之一。但有一点使他与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論者不同，即他公然贊同采用革命方法与現存制度进行斗争。斯宾士說，私有者的收入就像参孙^①一切力量之所在的头髮一样。你得剝下他們的头皮。假如非利士人当初不剃他的头髮，而把他的头皮剝下来，那末，非利士人就能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神殿。^②土地占有者是我們的敌人，他們在我們中間扎下营盘，以便對我們进行勒索。必須从根上消灭所有这些参孙。必須彻底鏟除現存的土地占有制度。人民不仅有这项权利，而且也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项权利。人民只要說：“土地是我的”，土地就会归他們。斯宾士的这种論断的革命色彩，使他同十八世紀初叶的法国共产主义者梅叶(Meillet)非常接近。

在十八世紀英国的著作中，还很少見到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毫无疑問，华萊斯(Wallace)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他非常詳細地描繪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根据他的意見，这种社会制度可能是与現存的社会制度对立的。在他的理想社会里，沒有私有制。这种

^① 参孙是一个大力士，但他的头髮一被剃掉便失去力气，变得和常人一样，等头髮长出来后又可恢复原来的力气。非利士人用女色迷惑参孙，把他的头髮剃掉，挖掉他的眼睛。后来，他們又拿他来当众戏弄，但参孙这时因头髮已长出来，力量已經恢复，他用力把非利士人的神殿傾复，与三千多非利士人同归于尽。故事出自《旧約全書士師記》。——譯者

制度被绝对禁止。每个成员都为社会工作，由社会供养。一切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每个人都必须劳动。在华莱斯的^①思想体系中，有许多地方令人想起法国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的学说。华莱斯直接看到摩莱里的著作是可能的。

华莱斯认为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论据可以反对共产主义体系。他认为彻底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比现存的制度更良好的制度。但是十分遗憾，在产生和巩固私有财产的社会里，这种制度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在有贫富之分的社会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不会成功的。富人热中于保持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②制度，因为他们可从私有制中得到好处。因此，他们反对共产主义者的宣传，竭力破坏改造社会的一切计划。华莱斯设想可能出现一种偶合，聪明的立法者能够试图利用群众的革命情绪和富人政权的削弱来实现有理性的制度。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共产主义体系在组织上和在道德上完全站得住脚，也是难于长期维持下去的。在现存的制度下，私有制度所造成的物质原因抑制着人类的繁殖。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原因不再存在，但在若干时间后，地球上的人口就会过剩，共产主义制度的一切优点将要失去意义。华莱斯的这种实质上毫无益处的理论，从来也没有对群众发生任何显著的影响。对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提出的抗议，多半反映在土地平均派的理论当中，这一派的理论更适合正在无产阶级化的群众的情绪，他们还没有放弃私有^③一小块土地或私有^④一座作坊的小资产阶级幻想。

III

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思想气氛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葛德文(1756—1836)受过彻底的宗教教育。他的父亲是加尔

文教的傳教士，他自己也准备献身于宗教事业。当了几年牧师以后，葛德文的世界現在十八世紀启蒙学派的著作的影响下，首先是法国的启蒙学者的著作的影响下，发生了急剧的轉變。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葛德文与基督教断絕了关系。在他大量地展开文学活动以前，他就已經是个彻底的无神論者、唯物論者和决定論者，虽然加尔文教的痕迹，仍流露在葛德文这一时期关于推理的一般邏輯方法，以及他所特有的道德原則的公式上面。在他的道德原則中，往往令人想起福音書上的詞句，或好象“神甫”們的說教。

他热烈欢迎的法国大革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他的才华迸发的年代。葛德文的文学遺產非常丰富。他的最光輝和最深刻的作品，是两卷《政治的正义及其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影响》。^①这部著作是在英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最高漲时期，于1793年出版的，它是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在英国文学中的最独特和最有意思的反响之一。

毫无疑问，葛德文对于現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抱的批判态度，在他著作《政治的正义》一書的許多年以前就形成了。据他自述，斯維夫特（Swift）、霍尔巴赫、爱尔維修（Helvétius）、卢梭（Rousseau）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发生了影响。大概，伯克（Burke）在1790年出版的反革命小册子《論法国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驅使葛德文以完整而彻底的体系叙述其观点的直接动因。在《政治的正义》一書出版后，葛德文又繼續了約四十年的文学活动。他写过数部长篇小說（其中最优秀的是《凱勒布·威廉斯的轍事》，出过几部政論和历史性

①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by William Godwin（以下簡写为“*Political Justice*”——《政治的正义》）V.1-2. London, 1793; 最新的版本，有1926年的紐約版，但略有删节。

質的著作。但他后来的著作，沒有一部能在价值上赶上《政治的正义》。

人类理性万能的思想，是葛德文《政治的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把葛德文的学说看作彻底运用唯理论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問題的典范。

葛德文把人的一切心理生活都归结为理性的活动。在葛德文看来，人在本質上只是会思维的机械。理性决定人的一切行为。人类本性中的理性能够主宰一切。理性对人的支配是这样的：人不能違反它的命令。意識是一連串的思想。人完全不是自己的情欲的奴隶。情欲是个不明确的概念。人們所謂的情欲，只是一种活跃而明晰的思想。葛德文說，願望是即将見諸行动的已成熟的思想。^①

人类的智慧严格按照因果律来活动。人有两种能力，即感受周圍环境印象的能力和进行思维的能力。周圍环境的印象是思维器官所必需的食粮。沒有周圍环境的印象，思维器官就是空虚的，而人也就不能其为人了。^②人生来沒有带着什么天赋观念。在智慧方面，人完全是环境的产物。^③ 葛德文重复十八世紀法国唯物

① 《政治的正义》，第1篇第5章；第8篇第5章。应当指出，从葛德文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与他的这种相信理性必胜的論点显然矛盾的个别的論述。他說，人类的智慧有时会去维护自己的謬見，如此善于想出各种詭辯来为謬見辯护，以致遮断了树立更有根据的論証的道路……自欺是最輕浮的行为。誰要是热烈地希望自己的立論是正确的，誰就不知不觉地服从适合自己願望的意見。几乎不論在什么时候，信念总只建立在明晰确凿的基础上。許多論据經常是通过不足凭信的媒介被人領悟的，这种媒介有时把論据抬高到阿尔卑山頂峰那么高，有时又把它压低得一文不值（《政治的正义》，第二版，1796年，第1卷第155頁）。看来，葛德文並沒有发觉我們以上指出的矛盾。但是，类似上述的一类論断，无论如何不会影响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特点。参看弗雷歇尔：《威廉·葛德文。关于自由主义的研究》（William Godwin, A Study in Liberalism），倫敦，1951年版，第148頁。

② 《政治的正义》，第8篇第1章。

③ 同上，第1篇第3章。

主义者早就提出的论点，断定人的善恶只是由环境造成的。为了造就出好人，就需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葛德文所指的境环，首先是指道德环境——制度、法律和教育。葛德文认为自然环境（气候等）的影响没有什么重大作用。

建立良好的环境，对于未来的人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生活条件不完善时，人类的智慧就要熏染上偏见和谬见；而在健康的环境中，人类的智慧，从而整个人类，也将是健全的。只有当理性和道德的原则在社会的管理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才可能把这个环境称作健康的环境。政治上的公正，也就在这里。^①人类的理性在发现自然界各种规律方面所获得的伟大成就，鼓舞着葛德文。他兴高采烈地欢呼，人已学会预测日蚀和月蚀，衡量空气的重量，说明各种自然现象，而使它们不再成为怪异现象……^②这使葛德文认为在研究社会关系时也能获得同样成就的希望加强了。既然人们在了解了外界的规律后获得支配外界的权力，那末，人们在发现社会环境的规律以后，便获得支配社会环境的权力。公正的制度，就是符合理性要求的制度。这种制度的规律，将会像其他任何真理一样，被人类的理性所发现。

即使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真理是永恒的，而且始终只有一个。由此可见，只有一个合乎真理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对人类总是自然的；对社会总是有用的，不依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为转移。摆脱了无知和错误束缚的理性，必然要承认这种制度。行政管理完全不当迁就民族的特点、习惯和偏见。^③管理形式的多种多样，不是人民智慧的美满结果。这是在理解政治真理方面表现的混乱的结果。

① 《政治的正义》，第1篇第4章。

② 同上，第2版，第1卷第75页。

③ 同上，第1篇第7章。